

黄金的品格

传记文学选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黄金的品格

■ 传记文学选 ()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黄金的品格

——传记文学选（二）

朱明雄 编

*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插页 243,000字

1987年6月第2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5,200册

ISBN 7-5399-0012-1/I·10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56 定价：2.20元

责任编辑 苏文

目 录

- 我的历程·····伍修权(1)
- 黄金的品格·····张 扬(116)
- 记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
- 张大千敦煌三年·····杨继仁(157)
- 美的追求者·····柯 岩(227)
-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·····泰 栋 李 政(260)
- 重印后记·····朱明雄(308)

我的历程

伍修权

一、红星引我上征程

一九〇八年，我出生在湖北武昌。由于家境贫困，直到十二岁时；我才获得正式上学的机会。当我读五年级时，来了一位新的级任老师，他就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同志。他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，成了我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人。他在次年冬季亲自介绍我参加了“SY”，即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在他的直接引导和帮助下，我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小学毕业后，由于我家庭经济困难，无法升入中学求学，只得去找工作做，这时，恰逢武昌的共进书社招收学徒，我即前往应试，结果被录用了。

这是一家常卖革命书籍的进步书店，原来就有团员，我去后共有三个人，便组成了一个团小组。我开始不大会卖书，就做些粗活和跑腿，为几个学校送书。天热时为经理打扇子，也算是我的工作之一。那时还没有电风扇，只是在房子里吊了个大布裤子，不断用绳拉着前后摆动，就生出风来，我就是这个风扇的“动力”。除了这些杂活，还要我帮助誊写账目，所有这些工作，我都尽力把它做好。

正当我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慰藉的时候，我的生活道路又意外地发生了转机。我在小学时的同学，经常来书社购买书籍，他们见我在那里当学徒，很为我的失学而惋惜，建议我还是去读书，

并主动提出可以帮助我交学费。我就离开书社，插入武昌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一年级去继续读书了。

这所附中离我家有十来里路，我每天步行上学，来去要花两小时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，又没钱在学校搭伙，只能用零钱买点大饼充饥，赶上没有零钱了，就得饿肚子。有一次，不仅我自己饿肚子，家里也断了炊，全家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我偶尔向一位亲密的同学谈了这情况，他非常同情，解囊相助了我一枚银元。我忙拿回家买了大米，使全家度过了这一次不小的难关。

当时，我生活虽然这样清苦，学习又是那么紧张，可是参加革命活动的热情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我经常和我们团小组的同伴一起，出去散发革命传单和标语。一九二四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我们沿着武昌的长街，见到坐在车上穿着朴素的人，就将传单送给他们。我们还把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”等标语，贴到武昌一些最繁华的街道上。

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，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高师附小的临街楼上的会议室，召开了二十多人参加的党团员会议。记得陈潭秋讲的是列宁逝世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国际共运的关系。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路过钱介磐老师的家门口，他把我叫住了，说有重要的事要和我谈。原来孙中山逝世后，苏联共产党为了纪念孙中山，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中山大学，培养各国革命的干部，我党也选调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前去学习。钱介磐老师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找我征求意见的。他问我想不想去，我当即表示：愿意去！那时，我们对苏联很向往，认为那是穷人的天堂，能有机会去学习，当然求之不得。

回到家里，我高兴地向父母说了这事，他们竟没有一个反对的，父亲当即讲了些勉励和嘱咐的话。但是，我要远走他乡，也有难以解决的难处，这就是按当时的规定，出国前从汉口到上海

的路费必须自己解决。我家那么穷，求个温饱都有困难，哪里拿得出这一大笔钱来！正在我焦虑之际，我在小学六年级时的级任老师张朗轩，慷慨地拿出了四十块钱，使我交了到上海的船钱，还给我买了衣物等日用必需品；有个同学，还送了我一件旧的短大衣，使我出国后安然度过了严寒。这些在我困难时给过重要支援的人，我一直感谢并怀念他们！

一九二五年农历八月中秋，皓月当空，大地格外明亮，这个日子我太难忘了！这天，我父亲打了二两酒，母亲炒了一盘肉和一盘鸡蛋，全家为我饯行。当时我才十七岁半，但是为了革命需要，却要远离家庭和故乡了。当天夜里，我们乘的轮船就顺着长江的波涛开航了。

到达上海后，我们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住进一家旧式的小旅馆里。在这里我们焦躁不安地等到十月下旬，好消息传来了。说一艘回海参崴的苏联煤船，可以把我们带到那里，然后再转乘火车去莫斯科。这一天，我们带着自己的行李，步行到黄浦江码头，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，乘小舢舨划出吴淞口，登上了停泊在长江口的苏联煤船。先后上船的共有一百多人，他们中有张闻天、王稼祥、乌兰夫、吴亮平、孙冶方等等。

我们乘的苏联煤船从长江口起航，在海上航行了几天，恰巧遇上苏联十月革命节八周年的纪念日。船上举行了纪念会，由苏联船长主持会议，首先由他演讲十月革命的意义，然后又邀请中国同志讲话，接着还欢迎同船的日本和朝鲜同志讲话。在这艘船的甲板上，我第一次听到了《国际歌》，那悲壮的歌声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。开始，我只能跟着哼哼，慢慢也就会唱了。

二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

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前后，我们到达了海参崴。苏联船长

带着我们中的带队人，先行上岸去与苏联的有关方面联系，很快为我们安排好火车。我们一下船当夜就向莫斯科进发了。

那时的苏联火车，每节车厢安了个取暖的大油桶火炉，火车头是靠烧柴生火发动的，每走几站就要停车搬装新的木柴上车，要不火车就无法开动。车厢内是上中下三层木板铺，没有垫和盖的褥被。幸好我有那位同学送的一件短大衣，它帮助我通过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。这种生活现在看来似乎难以想象，可是那时年纪轻，身体好，情绪高，硬是这么闯过去了。

在这个时期，苏联的经济还十分困难，火车上的伙食只有面包、黄油、方糖和开水之类的东西，但已经算是优待我们了。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吃不惯，特别是黄油。不过，我倒觉得很可口，还创造了自己的吃法，把黄油和糖放在一起，用开水一冲，又甜又香。它的味道和营养，比我家里的伙食要好得多了。

我们乘的这列火车在路上行驶了约两个星期，于十一月底到达莫斯科，那时，这里的天气已相当寒冷了。我们被接到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的中山大学住下。

中山大学面临大街，对面是一个大广场，还有一座俄罗斯有名的大教堂。我们开学后，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做体操，体育教员据说都是从瑞典专门请来的。广场南端还有个不小的公园，学校楼前也有个小花园，我们下课后常去那里呼吸新鲜空气。

我们进校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由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员同我们谈话，问各自的姓名、籍贯、家庭成分、文化程度以及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。同时又请了裁缝、鞋匠，专门为我们每人做西装、大衣和皮鞋等。然后开始编班，发学生证。记得我当时学生证的号码是七十三号。我一生有两个号码记得最清楚，一个是这个七十三号，还有一个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关“牛棚”时的四十二号。

在我们这一批学生到达以后，又来了两批学生，一批来自我国广州，他们也是乘船经海参崴来的；另一批是从法国、德国、比

利时等西欧国家转道来的，他们中有邓小平同志等。

学校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，每班约二十多人。我们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和俄语等。在班上我的文化程度最低，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却不是最差的。这主要是我有自知之明，采用了“笨鸟先飞”的方法获得的效果。

在所学的课程中，我对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最感兴趣。当时我曾总结了学习俄语的三条经验：一是抓好语法的学习；二是多记单词；三是利用各种机会练习听和讲俄语。政治经济学的有关剩余价值的理论，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，我找了不少这方面的教材和辅导材料，认真地阅读。所以后来由我来担任这门课的翻译，能够比较准确地翻译和讲解老师的论述，使同学们听了也比较满意。

我们在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受优待的，一九二六年五月，学校还把我们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去。那里环境优美，景色宜人，虽然设备一般，但是每天早餐是牛奶、可可、鸡蛋、黄油和面包，伙食相当好。上午专门有位教员给我们读报，讲当天的时事和新闻，其余时间就是休息、散步和搞体育活动，那时，苏联建国还不到十年，就组织这些活动，使我们觉得社会主义制度真关心每一个人，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早日实现呵！

学校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，可称是尽心尽力安排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学校曾专门派人到远东去采购海参、香菇等物品，给我们改善伙食，衣、食、住等各方面，都对我们照料得很好。我们初去时，学员人数不多，集中住在校内的大寝室里，每个房间住二十多人，后来学员多了，就分散到外面好几个地方去住了。

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是几层楼的宽大楼房，有宿舍、教室、食堂、小吃部和办公用房等，不久还修了个俱乐部。从当时的眼光看，真可说是富丽堂皇的了。

我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，恰逢联共（布）十四次代表大会，展开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。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，我们学校中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。

我当时虽然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，却有着传统的正统观念，一直很明确地支持斯大林的联共中央路线。但是在我的同学中，有些人却是支持托派观点的，这主要有两种人：一种人特别欣赏托洛茨基的才华和知识分子气味。我校学生都听过托洛茨基的讲演，他能用英、法、德、俄各种语言演讲，他的才气确实能吸引一部分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；另一种人是从国民党的反动观点出发，拥护托派，反对斯大林。学校中支持托派观点的同学，在辩论会上，捧出一大摞列宁著作，一面翻书，一面发言，说在什么书多少页上，列宁是怎么说的，引经据典，振振有词地为托派辩护，很有煽动性。

三、这里并不风平浪静

从我们来到莫斯科不久，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联共（布）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，这期间的中山大学，也处于紧张的气氛中，同学们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斗争，有的人竟成为学校中托派的头头；有的人因此被开除党籍、团籍；还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劳改或遣送回国，以后也继续受到审查和处理。

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拉狄克，是国际共运的有名人物、波兰人，他的德文和俄文都很好，常常不拿稿子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，很有学问，他后来也成了托派的重要成员。副校长是米夫，后为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长，一九二七年、一九三〇年两次来过中国，我党有名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他一手导演的。

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制造白色恐怖，中国大革命遭

到失败。这些变化很快反映到苏联的中山大学里，同学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争论。当时苏联报纸上也登载了有关中山舰事件、农民运动的消息，以及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。我当时对机会主义实质理解不深，不过，对陈独秀不让农民围攻长沙，下令武汉工人缴枪，心中是很不满的。

在这期间，李立三曾到莫斯科，在中山大学作过报告，向我们讲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，还讲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。谭平山也在大革命失败后到过苏联，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里作过报告，讲农民运动，也作了自我批评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，他当过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，一九二七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陈独秀下令停止农民队伍进攻长沙，就是通过他去执行的。他讲话时，在每一句话中都要带一个“这个”，这样，从头到尾有无数的“这个”，给大家留下了谈笑的资料。

在学生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：一种是对少数国民党分子的斗争；一种是对共产党员内部动摇派的斗争。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，态度明朗。持国民党观点的人，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，有的共产党员受他们的影响，转向了国民党方面。

在我们以后，王明、博古等也先后到了中山大学。王明他们看不起国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，搞不团结，控制了学校党组织“共产党支部局”，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小宗派。但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，我已离开了中山大学，到军事学校去了。

我们后来住的地方离克里姆林宫不远，有时在路上可以碰到步行上班去的斯大林。他总是穿着一身红军的衣服或呢大衣，很随便地走着，不见身边有警卫人员。当然，也可能警卫人员化了装，隐蔽地跟在近旁。但是，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，能这样步行上班，不由使我们由衷地产生出无限的敬意！他到我们学校来讲话时，也是穿的红军大衣，抽着他那个烟斗。他是格鲁吉亚人，俄语发音不那么准确，讲话比较慢，但用词十分准确，有

一股深沉、坚定的力量。

一九二七年九月，我们在中山大学的学习告一段落。这时，由于国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相继叛变，大革命遭到失败，学校让一些同学回国。第一批大都是些国民党分子和倒向国民党观点的人，他们是经过蒙古回国的。第二批主要是党团员中比较能干、学习得好的，有选择地先行回国，他们也都是路经蒙古回国的。本来我们都要陆续回国，但以后经过蒙古的通路中断了。最后中央决定我们到苏联军事学校去学习，准备回国参加武装斗争。同时，又从国内派来一批经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同志，还有一些上海工人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武装骨干，陆续到苏联的各军事学校去学习。

根据组织上的指示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学校。我当时考虑到学海军和空军还不切合国内的实际需要，便决定报名到步兵学校去学习。

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巧合，一九二五年中秋从湖北动身赴苏，是十一人，这次，中山大学的同学中，报名去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的，连我在内也是十一个人。学校为我们编了一个特别班——中国班。

我们十一个人也分两派，有些人是支持托派观点的，他们每逢星期天，就到中山大学去，找他们托派观点的人联系，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搞串连。我们之间常常为观点不相同而争论。连队主体是俄国同学，其次是朝鲜同志，我们的队列班长是朝鲜人金国龙。连长是一名红军战斗英雄，红旗勋章获得者。

在莫斯科步兵学校，我接受了整整一年的军事训练，学习的内容有战术、兵器学、地形学、炮兵、工兵课目、政治工作、政治经济学和俄文。有个老华侨给我们作翻译，实际上有许多军事术语他翻不出来，这倒给我们创造了锻炼直接听俄语课的机会。这里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活泼，除课堂听课外，还有队列、打靶、投

弹、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。夏天组织我们外出野营，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；冬天冒着呵气成霜的严寒，每天拂晓起床后，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，进行跑步操练。这时，我们都穿着红军大衣和大皮靴，往往累得汗流浹背。

四、步兵学校的中国连

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时，我们步兵学校的学员，作为苏联红军战士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典礼。这天，莫斯科上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天气相当寒冷，可是我心里却热血沸腾，一清早就精神抖擞地去莫斯科大街上集合了。时间一到，我们排着整齐的分列式，在红旗的引导和军乐的伴奏下，擎着步枪，迈开阔步，通过红场的列宁墓前，接受了斯大林和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检阅。

几十年后，我在北京天安门城上，参加我国的国庆节阅兵观礼，不由使我想起那次在莫斯科的情景。追忆往昔，不仅使我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壮大，也看到了个人的成长。我后来能在军队和政府中担负一定责任，与我当初曾经象一个普通战士那样，接受严格的训练是分不开的。

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，从上海等地又来了一批中国学生，他们先到东方大学经受一年政治训练，于次年秋天被派到步兵学校学习。这时学校就成立了一个中国连，有三个排。当时，我班的其他同志，有的另外分配了工作，有的已秘密地被派回国内去了，而我被留下，当了政治和军事课的翻译。

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，我们团支部邀请瞿秋白同志到学校来同中国学生讲课，他慨然应诺了。他完全是个学者的风度，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不摆架子，十分和蔼可亲。他给我们介绍了党的“六大”的情况，并对盲动主义作了自我批评，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。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关心自己国内的革命形势，当时的苏联

人民也很关注中国的革命事业。有次，我在黑海边的安拉普休假，当地集体农庄得知后，就来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晚会。到那里后，他们又要我谈中国的情况。

一九二九年苏共党内进行的大规模清党运动，也波及到了步兵学校的中国连。这年夏天，中国连停止了正常操练课，全体党团员集中时间进行清党活动，前后有一个多星期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国内各省去的，互相都不大了解，组织上也没有掌握什么材料，因此只能由每个党团员自己谈，也是搞人人过关那一套，出身不好的同志，都要作严格的检查和接受不同程度的批判。由于我当时还是团员，出身也比较好，没有对我提出什么问题，我也没有参加对别人的处理。

同年十月，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，中苏之间引起了边界战争。这时，要从步兵学校抽调一批翻译到远东去协助苏联军队工作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，先到伯力，后分配到一个营里当翻译。

这个营曾乘着内河的舰艇，经由黑龙江向中国境内航行，经过一昼夜，进入松花江边上的富锦，部队上岸后驻扎在县城的街道上。当时，这里的地方部队已撤走了。我们接受了一个任务，动员当地老百姓到一个面粉仓库去搬面粉，谁愿拿多少就拿多少，不受什么限制，还让他们叫别人也去拿。老百姓得到消息后，欣喜雀跃，一时间，满街都是背着面粉的人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就接到上级通知，战事宣告结束，部队仍然乘原艇回到了伯力，我则又被安排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去工作，名义是见习员。

在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的一段时间里，领导上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，正由于这个原因，我在那里由共青团员转为苏联共产党(布)的候补党员。

一九三一年，我已在苏联生活了五年多时间了。虽然那时候苏联的生活还比较艰苦，但与国内的同志以及和我的贫寒的家庭

生活相比，已不啻天壤之别了。我除了正常所得的优厚待遇外，还有不少额外的收入，公余时间为宣传部门翻译各种文章和小册子，常有稿费可得；买公债又连得了几次奖；生活相当安定而舒适。因此，有的同志常常来敲我的竹杠，要我请他们下饭馆，吃羊肉串。可是我在那里却一直不安心，怀念祖国之情，渴望投身于国内火热的斗争的意愿，日夜萦绕在我心头。一来报纸，我首先查找有关中国革命形势，尤其是武装斗争的消息。一想起祖国的同志正在进行英勇战斗，不惜流血牺牲，亿万人民还在反动派统治下，忍受着痛苦和凌辱，我就食不知味、夜不成寐。

当年我二十三岁，正是血气方刚、精力旺盛的时候，实在不甘心于坐办公室的生涯，就向领导上提出了回国的请求。领导上说这里工作需要，不能放我。我再三提出，领导上又答复我说，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，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世界革命服务，最后又说，即使他们同意我走，伯力的党组织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，要我服从组织，我的请求就被搁下了。

那时候，常有中国同志在苏联找爱人，苏方对此事还十分支持。有的同志在那里结了婚，果然“乐不思蜀”，安心呆下了。当时领导上对我这事很关心，且也有这种条件，我原来所在的共青团组织里就有不少女同志，与我接触很多，相处得很好，只因为我那时一心想回国参加斗争，一点没有考虑这一类事。

五、祖国的召唤

苏方支持中国同志在苏联找爱人，这触使我心生一计，我向领导上说，我有一个女友到了莫斯科，很想去看看她，待见了她以后我马上回来，争取她同我一起来到远东。领导上对我的话竟深信不疑，他们痛快地批准我请假，还帮我买好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票，开了住招待所的介绍信，他们没想到这是我的金蝉脱壳计。

我所要奔向的哪里是什么莫斯科“女友”，而是祖国——“母亲”，是她在吸引着我，召唤着我！为了及早回到祖国去，我撒了一次谎，却获得了成功。

“五一”节后我到了莫斯科。在招待所一住下来，就首先去找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，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陈述了回国的愿望，我说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，一定需要大量干部，特别是军事干部，我在苏联学的就是军事。早在一九二七年国内大革命失败，我到步兵学校学习时，就下定了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决心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听了我的谈话，表示支持我。但是，由于我已是联共党员，又在远东工作。他们不能直接调动我。他们就为我写了一封盖着中共代表团印章的信，让我拿着它直接找苏共中央组织部面谈。

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到了苏共中央组织部递上了信。看来那里十分重视，马上由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。这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，很有身分，也很健壮。她的办公室布置得很有气派，临街一面是她的一张办公桌，室中有开会用的圆桌和成套的沙发。她客气地让我先谈，我知道这场谈话将决定我的去留，一定要争取达到目的。于是，我诚挚地讲了我对祖国的思恋，说我应该把我在苏联学到的知识和本领，运用到祖国的实际斗争中去，不辜负苏联共产党及苏联同志们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。现在我作为一名苏联共产党的党员，向党汇报自己的想法，恳请党能考虑我的要求。我的这一番谈话显然打动她了，等我说完，她就表示很赞赏我的态度，认为我讲得有理，应予支持，马上写了给中共代表团的复信，同意我回国工作。

此刻，我心中象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拿着复信飞快跑回中共代表团。行了！这一关顺利通过了。中共代表团也答应尽快安排我回国。我问，是否要办什么手续？要不要回伯力去向组织上说明白，把工作也办个交待？代表团的同志说一切手续将由他们去办，

他们将负责同伯力联系，我不必去了。

当时秘密回国有三条通路，一是从西欧绕行；二是走海参崴海路，这两条比较安全，但费时太长，路费贵。我因回国心切，选取了最快但不安全的通路，即从陆路偷越国境回国。一切手续办完，我登上了离开莫斯科的东去列车。伯力的同志以为我正在莫斯科愉快地与女友会面，他们哪里知道我已远走高飞，首途归国了。

离开莫斯科后第一站是赤塔，那里有一个秘密联络站。所有出入中苏国境的人员，都由那里作出具体安排。我到达时，见到不少中国同志，但是按照规定，不能互相打听去向，只能心照不宣，招呼示意。联络站组织我们用各种方式分批离苏，陪同我的是一位中国东北籍的同志。他的俄文姓氏叫库图佐夫，与俄罗斯一个著名统帅的姓氏相同。我当时叫皮达可夫，也与苏联一个有名人物同姓。哪知道就为这个名字，几十年后我吃了点苦头。康生“在文化大革命”中说：“查查伍修权是不是托派，他不是叫皮达可夫，在苏联《真理报》上发表过反动文章的吗？”是的，当时苏联是有个托派分子叫皮达可夫，确实发表过反对斯大林的文章，不过他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，苏联国家银行行长，同我这个才二十来岁的中国留苏学生，根本扯不到一起。康生这样说，完全是信口胡说，企图置人于死地而后快。

我同那位库图佐夫一起，由赤塔乘火车到中苏边境处的另一个秘密交通站，准备越境回国。那时已是六月，站上让我换了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裤；将发给我们作越境后的路费用的美钞和中国票子，用一条围腰布卷起来缠在腰里；除此以外，一切可能暴露身分的东西都不让带。事实上，因为我原来是去莫斯科看“女朋友”的，所有个人衣物全都留在伯力，确是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的。站上见我身体比较壮实，让我遇到盘查时，说自己是伐木工人，别的什么也不能承认。当时边境两侧居民，常在两国间来回做工或